

## 中韩历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认识论<sup>(\*)</sup>

○ 王 臻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天津 300387)

〔摘 要〕历史研究中, 学者们经常会遇到如何保持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一致性的问题。就中韩关系历史研究而言, 应如何坚持民族主义史学观, 在过去和当前的社会, 有些史学家的做法较为偏颇, 以至于出现了对历史现象的误导。针对关于民族主义的一些不正确倾向, 文章对民族主义史学观的弊端进行辨析, 提出要反对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史学观, 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 做到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统一, 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观贯彻爱国主义, 并指出在中韩历史研究中贯彻爱国主义原则的四点主张, 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中韩关系的历史会有所裨益。

〔关键词〕中韩历史研究; 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 认识论

DOI: 10. 3969/j. issn. 1002 - 1698. 2017. 01. 020

民族主义认识论是历史研究中需要面对的问题, 对于中韩的历史研究也不例外, 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民族主义观。但是, 应如何看待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对此, 笔者在参阅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谈一下自己的一点粗浅认识, 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 一、关于中韩历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观

“民族主义”一词, 来自英文“nationalism”, 是资产阶级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和政策, 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但是,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能抽象

---

作者简介: 王臻(1969—),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历史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对朝(韩)关系史。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清朝兴起时期中朝政治秩序变迁研究”(14FZS027)、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项目“17 世纪朝鲜廷臣对明、清观研究”(AKS-2016-R42)阶段性成果。

地谈论民族主义,而应当对其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民族主义也有两重性:一方面,资产阶级乃至帝国主义用鼓吹民族主义的方式对其它国家和民族实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抹煞阶级矛盾,以达到为其侵略扩张政策服务的目的,这是反动的;另一方面,在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本民族反抗异族统治的斗争中,在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在当代民族独立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侵略扩张的斗争中,民族主义则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可以说,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凝聚整合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也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sup>(1)</sup>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或社会理念,民族主义在历史研究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这就形成了民族主义史学。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民族主义应以一分为二的观点进行看待,我们反对的是反动的民族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而就民族主义史学而言,我们的态度亦应如此。所谓的民族主义史学,都注重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叙述历史,但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就东亚国家来看,近现代史上,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其侵略扩张的目的,经常大肆鼓吹其反动的“皇国史观”,这是他们的民族主义史学。而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以及曾变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也有人为解救自己的国家而大肆宣扬过民族主义史学观。例如,梁启超著有《新史学》云“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又云“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sup>(2)</sup>朝鲜民族主义史学家申采浩(1880-1936)的“历史观受到了梁启超的很大影响,从其研究历史的方法中可以看出与梁启超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sup>(3)</sup>在其《读史新论》中曾说“支那司马迁、班固之著述尽是一姓之传家谱”;又说:“舍民族几无历史”,进一步指出“但至今,一国的兴亡则在于全体国民的实力,而不是在于一、二位豪杰的身上”<sup>(4)</sup>。申采浩认为,新罗时期的花郎道思想<sup>(5)</sup>是朝鲜的主流民族思想,是朝鲜史的代表史观。应当说,像梁启超、申采浩这样的民族主义史学家在反传统、反封建方面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有利于对抗日本殖民统治者对中国、朝鲜历史的歪曲,唤醒国民的民族意识;但是,他们对历史的看法皆过于偏激,并非科学的历史观。

下面以申采浩的民族史观为例,剖析偏执民族史观的错误性。由于申采浩过分强调民族主义,导致了其对朝鲜历史的片面认识。韩国历史书籍《檀古记》<sup>(6)</sup>的序言中,曾慨叹“国无史”,故而以此书充当国史。受此影响,申采浩也否定了包括《三国史记》在内的朝鲜史书的记载。例如,他在《读史新论》中解释好太王碑<sup>(7)</sup>的相关内容时,将“碑离”解释成匈奴的后裔,将“过富山”这一动宾关系的短语视为一个名词,即山名附会为“巨富山”,用同样的手法将动宾短语“负山”亦视为山名。同时,他认为“巨富山”为今天的阴山山脉之邪卧龙,定“负山”为今天甘肃省西北部的阿拉善山麓吉尔泰地区。申采浩的做法,是试图证明高句丽广开土王的足迹业已达到了遥远的甘肃西北,说明高句丽版图的广大。另外,申采浩将日本列岛看成是百济的属国,把百济对倭国的文化影响看成是对

属国的教化,甚至说百济曾用“百济假名”替日本制造了“日本假名”。并且,申采浩站在国粹主义立场上宣扬所谓“民族”史学时,将“事大史观”同“殖民史观”相提并论,对“事大史观”深恶痛绝。应该指出,“事大史观”与“殖民史观”是存在着很大差别的。<sup>(8)</sup>申采浩在《读史新论》中对《三国史记》及其作者金富轼进行极为偏激的“评价”,他说“许多前辈都说三国的文献毁于兵火,以致金富轼史料匮乏,他编纂的史记才会漏洞百出。其实不然,比兵力更严重的是金富轼的事大主义,是他毁灭了史料”,他又说“《三国史记》为什么不载夫余和渤海?为什么不歌颂民族历史上的花郎、永郎、夫礼郎,却对已被唐化了的崔致远推崇备至?为什么在列传中全然不见与唐军血战的福信,却大书特书黑齿常之?金富轼在人物评价方面昏庸至极,竟对勾结外来势力灭己同族的金春秋大加褒评,其实金春秋一生无功,惟有非恶”。<sup>(9)</sup>我们不难看出,申采浩在批判“事大主义”的同时,也否定了朝鲜的古代史。

仔细分析上述申采浩的民族主义史学观,应当说与他彼时所处的时代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亡国之痛的自卑,使其民族主义的心理情绪过于极端化。金富轼著《三国史记》,以新罗为中心、为正统,完全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与此恰恰相反,申采浩在其民族主义史学观的指导下,反其道而行之,提出“夫余—高句丽王族论”“檀君酋长论”“箕子邑尉论”等,并将满洲作为韩国来日复国之基地,妄图收复其所谓失去的“旧疆”。申采浩作为一个亡国之人,曾流亡中国,但他对中韩历史的发展却无正确的认知,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但是,申采浩的这种膨胀的民族主义史观,不仅在当今的韩国学界存在,而且在我们国内也有人受其影响,在其著作中亦将夫余说成了是朝鲜古代的国号。<sup>(10)</sup>应当说,在中国,大多数学者们早已将夫余排除在了朝鲜史之外,而个别人若不是有意接受申采浩的民族主义史学观,就是对历史的曲解,实在不可取。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抽象地反对民族主义,只是反对反动的或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在我们国家,应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因为他们都属于狭隘民族主义的范畴,是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定的。应当说,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已不多见了;但是,也不能说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业已断根绝亡。如果有学者将民族利益同国家利益分开,并将民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就是一种十分错误的观点。在我们国家,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其民族利益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谈不上有什么根本的矛盾,那些将民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说法,是非常有害的,我们应该坚决反对。

那么,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需不需要民族主义呢?笔者认为,还是需要的。应该说,只要有国家存在,民族主义就不会消失,因为尽管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有着各自不同内容的两种社会意识形态,但是二者之间常常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言:“民族主义和爱国之心活生生地存在于世界大多数地方。不论精英人士是多么不喜欢,大多数国家中的大

多数人都是爱国的,强烈认同于自己的国家”。<sup>(11)</sup>然而,在我们国家里的民族主义,所提倡的不应是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而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这种具有进步性作用的民族主义的本身就同爱国主义一样是不可分的,因为中华民族指的就是中国各民族,亦即指中国。关于这一点,著名朝鲜族学者姜孟山教授曾说过:“在我国历史上除了代表正统的占有统治地位的封建王朝外,在某些时期,各地区还出现过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区域性王朝或政权,他们都是历史上中国的组成部分,因为历史上的中国,不但包括占统治地位的中原王朝,也包括中原王朝以外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 and 政权。我们必须站在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立场来看待中国的历史,在中国的版图内,中央王朝与边区政权、部族的关系,都是国内民族关系,而不是中外关系”。<sup>(12)</sup>姜教授所说的“我们必须站在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立场来看待中国的历史”,就应当是我们所提倡的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历史观,这种民族主义无疑是同爱国主义相一致的。

## 二、如何在中韩历史研究中贯彻爱国主义原则

一提到历史研究中的爱国主义,有人就常常同历史研究中的“政治化”联系起来,这是不应该的。爱家乡、爱国家,这是自古以来就已有之的一种人类的“天性”,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理念,“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sup>(13)</sup>,只要是国家存在一天,那么爱国主义就应存在一天。当然,爱国主义并不是一种抽象的超时代、超阶级的社会意识,它应是一个历史的、阶级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内容,而不同的阶级对它也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的爱国主义同那种狭隘的爱国主义不同,是真正的彻底的爱国主义,它应处处维护国家的利益,但并不去损害他国的利益,而在历史研究中贯彻爱国主义原则,也必须是本着这种精神而为之的。那么,在中韩历史研究中如何才能贯彻爱国主义原则呢?笔者认为至少应做到下列几点。

第一,也是首要的,必须通过我们的研究将我国的历史与文化搞清楚,并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观去解释、去看待,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在历史研究中,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去做的工作是大量的,但这里强调的是,尤其首先应将我国边疆的历史与文化搞清楚。这是因为,在我国古代的史书记载中,常常有重内(指中原)轻外(指边疆)的现象,这同“得中原者得天下”的理念是有着重要关系的。就东北历史来说,由于人们对东北历史的研究尚不到位,甚至对东北历史的无知,导致在一个阶段里,有人将高句丽乃至渤海看作是朝鲜的古代国家,甚至认为东北地区曾是古代朝鲜人聚居的地方,将好太王碑看成是古代朝鲜人的文物,只是由于中国历代王朝都曾侵略过朝鲜,从而将朝鲜人都赶到了朝鲜半岛,中国的领土范围扩大了,朝鲜的领土范围缩小了。也正因为基于这种认识,有人认为我们有负于朝鲜,故而在领土上做出了某些让步。这是十分错误的历史观。

第二,对国外的某些歪曲我国历史,尤其歪曲我国东北史,从而提出领土要

求的做法,应有理有据地进行驳斥。在这一点上,清末的爱国官员吴禄贞就曾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彼时日本帝国主义与朝鲜反动派制造“间岛”事件,妄图将延边地区纳入朝鲜版图。吴禄贞在政府的支持下挺身而出,用大量的历史事实驳斥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谬说,雄辩地证明了延边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从而使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阴谋没有得逞。然而,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国外某些激进主义者还在借用日本帝国主义的“间岛”老调,试图再次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甚至声称“历史上,以间岛为中心的满洲平原,是我国(指韩国)民族的活动舞台,根据地,直到苏联的沿海州,都是我国的边疆”“白头山是产生过檀君神话的韩国民族的发源地”“白头山作为民族的灵山,堪称为倍达民族的摇篮”;“从远古时起,满洲和间岛一带就是我们倍达民族的主要活动舞台。继高句丽、渤海之后,虽几易其主,但居于此地之民族之根却没有动摇”“因此,我国国民应该牢记,豆满江对岸的间岛不是陌生的异域,而是我们同一倍达民族生息数千年的基地,应为收复这一地区而努力奔波”;“我们应具有坚强的历史意识:满洲是我们的土地。曾被赶出的犹太民族回到祖先土地加沙福地经过了400余年,再次离开巴勒斯坦散居世界,200年后,又回到祖先的土地,建立了以色列国。我们全体国民要把眼睛盯在满洲,应具有坚定不移的历史意识,应该具有不管到什么时候也要回到祖先的土地上生活的坚强决心。因为,在那里,有我们祖先的坟茔,有先祖们撒过鲜血的遗迹,有心中的故乡白头山”。<sup>[14]</sup>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这种强烈的“历史意识”包含着强烈的领土欲望,持有这种立场和观点的民族主义史学家,与持有日本帝国主义“皇国史观”的学者在本质上很难加以区别,这种民族主义史学观,是极端片面的。应当承认,具有这样片面认识的人乃是少数,我们邻国的大多数学者看问题还是比较客观的。但是我们也不要过于乐观,认为少数无关重要。其实,就历史上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而言,应该说都是少数帝国主义分子引起的,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是好的,不过也应该认识到,在某种历史时期或某种条件下,少数的反动势力也是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就当年丰臣秀吉的侵朝战争来说,不能说是日本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只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外扩张的侵略野心使然。<sup>[15]</sup>无论哪个国家或民族,极端民族主义者总是一小部分,但如果对这一小部分不加以认真对待,那么最终可能会酿成恶果。

现在,我们不能不正视某些眼前的事实,即某些持有极端民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的外国学者,不仅在国内的历史研究中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而且还热衷于“输出”自己的史学观,尤其想方设法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中国渗透,对个别意志薄弱的人有时也竟能起到一些作用。如此一来,有些学者极力回避一些十分原则而颇为“敏感”的问题,有的甚至随帮唱影,随声附和,抛开事实而帮着人家说话。就拿前几年对待“东北工程”<sup>[16]</sup>的态度来说,韩国人的反应颇为强烈,攻击的程度也颇为激烈,面对这种形势,倒不必值得大惊小怪,同时也不要过分地埋怨对方,因为在过去一个很长的时期,关于此类“敏感”问题的学术交流太少了,我们的正确观点得不到传播,甚至在国内也受到压制,现在由于

“东北工程”的启动使学者们被压抑的心情开始舒展了,尤其是对高句丽这样的问题,学者们有了一个发表意见的机会,掀起了一股研究热,这本来是很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但对韩国人来说,却觉得突然,在思想上接受不了。假如在早些时候多给国内学者的研究创造条件以有机会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韩国人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感到惊愕,但实际上,“东北工程”只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平台,我们历来提倡学术与政治分开、历史与现实分开的态度,学术研究是为了还历史以真相,并非像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去挑起所谓的“领土”问题。

第三,应加强正面宣传,普及相关的历史知识,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改革开放以后,历史知识的普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通过电影电视、广播报刊以及书籍的出版,而对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在此方面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尤其是对边疆历史的宣传,尚比较薄弱。就拿东北来说,包括许多知识分子、政府干部在内的广大群众,对东北边疆历史的了解还是很不够的,其中对许多历史问题的了解和认识颇为混乱,如对古朝鲜、高句丽、王氏高丽以及李氏朝鲜等,皆不甚清楚。由于过去某些错误认识的误导,有些人则认为延边或东北曾是朝鲜的领土。<sup>(17)</sup>

第四,学者队伍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应当进一步提高,爱国主义意识应进一步增强。我们说,学术与政治要分开,但这不等于说学者不应当有一个清醒、正确的政治头脑。可以这样说,一个政治观念不清的人,是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的,因为历史问题常常与政治问题密切相关。但有些人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在大是大非面前,置政治观念于不顾。至于业务素质的提高,似乎与爱国主义没有什么瓜葛,但并非如此。就中韩古代史的研究而言,即使某些“名家”也会出现“硬伤”,闹出笑话;而如果出版社或某些报刊的编辑人员由于业务素质不高,将带有“硬伤”的文章照旧出版、发表,显然这会影响我国学者的国际声誉,不能说这些“硬伤”会给我们国家争光。关于增强爱国主义意识的问题,并非可有可无。这里强调的是,我们提倡在历史研究中贯彻爱国主义原则,并不是要求学者们必须在研究中生硬地同政治扯在一起,戴上个爱国主义的“帽子”,为爱国而爱国。但是,我们也不能在书写历史或评价历史的过程中丑化国家的形象,做出些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事情来。例如,明代抗倭援朝战争,中国将士们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日军是被打败的,如果没有中国的出兵,朝鲜就有可能为日本所灭亡,侵略者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包括中、朝两国的最高统治者在内,在主流方面还是应当肯定的,而那些浴血奋战的将士,更值得后人予以颂扬,甚至自豪。但是,有的学者却相反,其热衷的是流传下来的极为不可靠的材料,给将士们罗织罪名,长他人之志气,灭自家之威风,哪里谈得上爱国呢?<sup>(18)</sup>另外又不得不提及,大概是受古代“事大”“字小”观念的影响,有的学者为了表现自己的“大度”,在学术问题上不坚持原则,甚至对学界关于古朝鲜、高句丽归属问题上的讨论多有微词,认为中国学者坚持自己的意见对“国际政治形势”的稳定不

利。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则对所谓“敏感”问题予以回避。

### 三、结 语

笔者认为,学术研究不应设禁区,尤其是对某些澄清错误认识且对国家有利的学术研究,更不能埋怨、指责、泼冷水,即使在同所谓的“小国”打交道时,也要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不能以损害民族和国家利益为代价去迎合他人的需要,不要看着人家的脸色去做自己的事情。笔者认为,无论国家与民族的大小,都应当是平等的,谁也不应该歧视谁,不应该损害对方的利益。忍让和助人是一种美德,但这里面还要有一个“度”和原则的问题。我们说东北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但有些外国学者偏偏说满洲在古代是朝鲜的领土;我们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有些外国学者偏偏说只有汉族建立的中原政权才是古代的中国,其他民族皆非中国人。外国人的这种论调,利用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等等大肆鼓吹、宣传,甚至通过游行示威、签名运动及外交抗议来干涉我们的学术研究,有的还借助旅游、国际运动会的机会<sup>〔19〕</sup>挑战中国对长白山的主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无论通过学术研讨会或撰写论文、著作以展现历史的原貌,澄清历史事实,都不能受到国内舆论的支持,这确实令人难以理解。一个爱国的有良心的历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不要失去我们的自信,为了祖国的尊严,应当去据理力争。

总之,作为史学工作者,对于中韩历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关系,应该辩证地去对待,要反对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史学观,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坚持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一致性,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观贯彻爱国主义原则,这样才能对中韩历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也才能促进日益繁荣的韩国学研究的发展,从而加深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与感情。

#### 注释:

- (1) 汪晖、张天蔚《文化批判理论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4期。
- (2) 梁启超《新史学》,初刊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新民丛报》,后收入《饮冰室合集》。
- (3) 〔韩〕高丽大学韩国史研究室《新编韩国史》,孙科志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页。
- (4) 〔9〕〔韩〕申采浩《丹斋申采浩全集·读史新论》,首尔:莹雪出版社,1977年,第52、84页。
- (5) 花郎道是朝鲜古代武术、跆拳道的前身,花郎道思想是借鉴儒、佛、道三教思想并融合一体从而形成的具有新罗特色的社会思潮。
- (6) 《桓檀古记》是近代韩国文人托名编造的一部伪史,其中有《三圣记全上篇》《三圣记全下篇》《檀君世记》《北夫饰记(上、下)》《太白逸史》等篇,在《三圣记全下篇》中有《神市历代记》一文,其中编造了“桓雄”十八世,每世皆有其名号及在位编年及具体年寿,多数皆活一百余岁,最高者活到一百五十一岁。在《太白逸史》中将桓仁、桓雄以及治(蚩)尤称为“三皇”,并记“蚩尤天王”曾派“降将少昊”在涿鹿大败公孙轩辕,从而“轩辕之属皆称臣入贡”。从《桓檀古记》的整体来看,尽是些荒唐之言,不实之事,但就当前来看,朝鲜、韩国学界接受《桓檀古记》唯心史观的人并非少数。参见刘子敏《史学观、方法论及其他——以古朝鲜、汉四郡及高句丽研究为中心》,载李国强、李宗勋主编《高句丽史新研究》,延吉:延边大

学出版社 2006 年。

(7) 好太王碑是中国古代东北边疆地方政权高句丽第 20 代王长寿王为其父广开土王(好太王)所立的功德碑。由于中韩学界对高句丽政权的归属问题存有争议,韩国学者认为高句丽是朝鲜半岛历史的一部分,故而在对好太王碑的解读上,不可避免地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

(8) 关于“事大史观”与“殖民史观”的区别,可参阅王臻《朝鲜前期与明建州女真关系研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年,第 229 页。另外,关于“事大”与“字小”的关系,笔者曾在拙文中,更相对深入地予以分析,见王臻《古代中朝关系史中“事大”与“字小”问题的认识论》,《学术界》2013 年第 3 期。

(10) 金京振《朝鲜古代宗教与思想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2 页。

(11) [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年,第 227 页。

(12) 姜孟山《高句丽史的归属问题》,《东疆学刊》1999 年第 4 期。

(13) 《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608 页。

(14) 转引自杨昭全等《中朝边界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年,第 35 页;杨昭全《中朝边界问题》,《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动态》1999 年第 1 期。

(15) 1592 年,日本封建主丰臣秀吉发动了对邻国朝鲜的军事侵略战争,史称“壬辰战争”。关于战争发生的原因,据杨昭全先生的统计,国内外学界提出的看法有 12 种之多(杨昭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年,第 102-105 页)。对此,笔者在分析了民族侵略本性、政治领土企图、经济利益追求、客观消极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着重指出了丰臣秀吉个人意志体现这一要素,认为这五个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壬辰战争的发生(王臻《朝鲜壬辰战争诸问题再探讨》,《求索》2016 年第 2 期)。

(16) 即“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于 2002 年启动,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东北三省相关学术机构及大学联合组织的大型学术项目,主要研究东北地方史、东北民族史、古朝鲜史、高句丽史、渤海史以及中朝关系史等问题,其中有朝鲜半岛学界敏感的高句丽归属问题研究。

(17) 此处所指的有两点,首先一点是,由于高句丽于公元前 37 年在辽宁桓仁建立政权,公元 3 年迁都吉林省集安,427 年又到平壤建都,据此有人认为高句丽在中国境内的发展也应是朝鲜历史的一部分;第二点指的是,某些人将今延边地区(近代史上曾称为“间岛”)视为朝鲜的领土。

(18) 对于明朝援军在抗倭战争中的作用,中外学者持有不同看法。大部分学者充分肯定明朝援军的正面作用,但也有人肆意否定。日本学者在书籍中,有很多歪曲事实的叙述,认为日军取得了壬辰战争的胜利。朝鲜学界过分夸大朝鲜军队的抗战贡献,韩国学者则从民族利益出发,对明军援朝的消极作用大力渲染。我国也有学者断章取义文献资料,大加贬低明军抗倭援朝的功绩,否认平壤之战取得胜利,认为收复平壤并不是以李如松为首的明军浴血奋战的结果,而是日本主动撤军,给明军留下的空城,而对后来的稷山大捷也认为是假的。还有论者极力夸大明军在朝鲜的负面影响,对流传的在平壤“辽兵割鲜人首级报功”“在开城割鲜人腐首报捷”之说深信不疑,认为明军“名为救援朝鲜而重虐之,奴隶其主,鱼肉其民”,着力宣传明军“镇压朝鲜义军”。笔者主张,对于明朝援军在抗倭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应当给予肯定,正是明朝军队的积极作战,才确保这场抗倭战争的胜利,打破了丰臣秀吉君临中国乃至东亚的美梦,使东亚的政治格局又恢复到战前的状态。

(19) 指 2007 年初在长春召开的亚洲冬季运动会上,韩国运动员在领奖时集体打出了“白头山(长白山)是我们的领土”的横幅。

(责任编辑:刘毅)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On Hsiung Shih—li's Thought of "Inner Sageliness and Outer Kingliness" —— and on Theoretic Dilemma and Future Tendency of Modern Neo—Confucianism's Developing—out Idea**

**Abstract:** "Opening up the new outer kingliness by returning to the origin inner sageliness" is the theoretical and cultural program of modern New Confucianism. The important prototype of this program can be traced to Hsiung Shih—li's thought of "inner sageliness and outer kingliness". Linking up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New Confucianism, comprehensive exploring the theoretical approach and the epoch connotation of Hsiung Shih—li's "inner sageliness and outer kingliness" thought thoroughly will be of great academic significance in understanding Hsiung Shih—li's status and influen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modern New Confucianism development, and furthermore the theoretical predicament and the future trend of modern New Confucianism development itself profoundly.

**Key words:** Hsiung Shih—li; modern New Confucianism; inner sageliness and outer kingliness

*Lin Jiahu*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On the Understanding about 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 in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the China—Korea Relations**

**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history, scholars often meet a problem of how to keep the consistency of 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 In terms of the China—Korea relations history research, how to maintain the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social, it is biased of some historians, that there are misleading to the historical phenomenon. Aiming at about nationalism some incorrect tendency, this paper differentiates and analyses the disadvantages of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proposed to oppose extreme and narrow nationalism historiography,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handle the relations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 the consistency of 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 to use the Marx doctrine history of science to carry out patriotism,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four point proposal implement the patriotism principle in the China and the Korea in the historical study. I believe it will be benefit to the people that how to correct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the China and the Korea.

**Key words:**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the China—Korea relations; nationalism; patriotism

*Wang Zhe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From Studies Based on Social Indicators to Social Indicator Movement: A Sociological Contemplation on Social Indicator Movement in the 20th Century**

**Abstract:** Social Indicator Movement originated from studies based on social indicators in the 1810s. Attention given to those contemporary social issues unleashed studies based on social indexes Which dominated economic researches and up to the 1960s had gradually evolved as